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Alexander der Große

Johann Gustav Droysen

希腊化史：

亚历山大大帝

[德] 约翰·居斯塔夫·德罗伊森 | 著

陈早 | 译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Alexander der Große

Johann Gustav Droysen

希腊化史：

亚历山大大帝

[德] 约翰·居斯塔夫·德罗伊森 | 著

陈早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化史：亚历山大大帝 / (德) 德罗伊森著；陈早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108-3

I. ①希… II. ①德… ②陈… III. ①亚历山大大帝(前 356—前 323)—传记
IV. ①K835.4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17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希腊化史：亚历山大大帝

著 者 (德) 德罗伊森

译 者 陈 早

责任编辑 赵 元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插 页 4

印 张 34.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108-3/K·482

定 价 11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中译本导言

亚历山大与西方古代的“大一统”

刘小枫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曾经为中国在近代的衰落背负罪名。直到今天，由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在一些智识人心底，“大一统”观念依然可疑。为了有助于自我认识，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西方古代的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与我国的“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大致相当的历史时期，去看看古代的西方曾经怎样追求过“一统”天下。

亚历山大的帝国昙花一现，这位西方的第一位天下帝王既没有实现“一统”政制，也没有提出过“一统”观念，如今的史学考证甚至没法最终证实，亚历山大的征服行为是否曾有一个明确的统治“天下”的计划在先。^① 严格来讲，西方古代的“一统”天下想象与罗马崛起为帝国的过程相关。引人兴味的是，当时为罗马帝国打造“一统”观

^① 参见 Alfred Heuß, *Alexander der Große und die politische Ideologie des Altertums* (1954), 重印于 Hans Kloft 编, *Ideologie und Herrschaft in der Antike*, Darmstadt, 1979, 页 129。

念的主要并非拉丁语作家，而是希腊语作家，他们通过打造历史的甚或哲学的亚历山大形象为罗马帝国提供“意识形态”，似乎想要借罗马帝国实现希腊人未能实现的“天下”政治理想。

由于罗马崛起时出现的“一统”政制观念与希腊语的“普遍历史”纪事写作相关，考察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为我们认识西方古代“普遍历史”写作的嬗变提供了机缘。^①

分离式城邦状态是内战状态

希罗多德《原史》的主题是希腊人如何在希波战争(公元前500—479年，周敬王20—41年)中击败波斯人。为此，希罗多德除了用三卷篇幅探究波斯人的民族志及其帝国的崛起，还花了两卷篇幅探究希腊人的民族志(卷5—6)，然后才讲述希腊人如何迎战波斯人。不过，卷一说到吕底亚王国面临波斯人兵临城下时，希罗多德借国王克洛伊索斯想向希腊人求援，已经说到希腊人当时的政治状况(1.56—64)。希罗多德说，克洛伊索斯经过探究首先发现，希腊人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单位，而是一些松散的城邦，最强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②希罗多德尤其说到，由于当时的雅典是僭主统治，整个城邦因党争而“四分五裂”(1.59.1)。这段描述虽然是在为后来证明雅典城邦凭靠民主政制才击败波斯人埋下伏笔，却也在提醒读者整个希腊世界“四分五裂”的历史状况。毕竟，希罗多德当时的读者是生活

① 严格来讲，“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与“世界史”(world histor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朝学界多把 universal history 译作“世界史”并不恰切。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嬗替关系，参见 Reinhart Koselleck, “Von der ‘historia universalis’ zur ‘Weltgeschichte’”, 见 Otto Brunner 等编,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and 2, Stuttgart, 1975, 页 686—691。

② 波斯国家已经官僚化，从而留意自己的档案；希罗多德乃至随后的修昔底德很少利用希腊城邦档案，很可能是因为，希腊城邦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保留档案的习惯。参见莫米利阿诺，《论古代与近代历史学》，晏绍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页 32—33。

在第二次伯罗奔半岛战争之初的雅典人,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们目睹过近百年来两个强势城邦争夺泛希腊世界领导权的历史。^①

古希腊的城邦政制时期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看起来颇有些相似,以至于国朝学界经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其实,“泛希腊”政治共同体由近千个大小城邦构成,虽然语言相同(方言不等于另一种语言)、宗教信仰相同乃至习俗相近,却长时期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单位——与此不同,中国的战国时期则是华夏周朝“天下”的分裂状态。甚至当今的犹太汉学家也看到,追求“大一统”是战国时期的“一贯”思想,当时“没有任何一个知名的思想家或政治家认为,多国制度合法和值得追求”。^② 对于我们来说,古希腊星罗棋布的分离式城邦状态所表征的是古希腊民族“自己选择最适合本地历史地理条件的发展道路”,甚至表征的是希腊人热爱自由的天性,抑或表征的是这个文明民族尚未完成自身的国家建构,毋宁说是更有意味的政治史学问题。^③ 使得这个问题得以成立的基本史事是:属于希腊民族的马其顿人最终把分离式城邦“这些零散的碎片建立起一个统一帝国”。^④ 在此之前,继雅典城邦之后,斯巴达和忒拜先后在泛希腊世界取得过政治优势(公元前 401—399 年和公元前 371—362 年),并谋求统一泛希腊城邦。我们的确很难说,古希腊人从不曾追求自己民族的“一统”。

① 参见葛蕾,《佩西斯特拉图的起势:〈原史〉卷一 56—68 节绎读》,见吴小峰编/译,《希罗多德的王霸之辩》,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页 212—213。

② 尤锐,《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孙英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页 37。

③ 关于古希腊城邦的实证史学探究,参见安德烈耶夫等,《古代世界的城邦》,张竹明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 62—68,91—104,175—186。关于泛希腊世界的统一问题的政治史学探究,参见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109—135。

④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页 18。弗格森的这部古代希腊帝国论成书虽早,论题迄今没有过时,比较:J. R. Ellis, *Philip II and Macedonian Imperialism*, London, 1976; P. D. A. Garnsey / C. R. Whittaker 编, *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页 91—144。

当面对强大邻国——波斯帝国的蚕食时，松散的希腊诸城邦未必能够抱团共同对敌。希罗多德带倾向性地探究雅典从僭政统治下的衰败到改制为民主政体后打败波斯人时的兴盛这段历史，并关注城邦政制类型的比较，表明这位纪事作家很可能想要探究这样的问题：雅典应该用何种政制来结束泛希腊的分离政治状态。^① 尽管雅典城邦崇尚“自由”，在希波战争中崛起之后，雅典并没有因此而不谋求统一碎片化的泛希腊。以雅典为首的提洛联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半岛联盟长达 30 年的战争（公元前 431 年至 404 年），或者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争夺民族领导权的伟大决斗”，事实上是希腊人致力于形成统一国家的内战：毕竟，“从法律上看，帝国时代的雅典第一个努力明确将诸城邦统一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②

修昔底德为这场战争写下了不朽的战争志，但在一开始，他讲述的是希腊人自荷马时代以来松散而又充满战争和内部党争的历史。表面看来，在这位伟大的纪事作家笔下，希罗多德的倾向被颠倒过来：民主政制让雅典人输掉了战争。^③ 可是，由于阿尔喀比亚德问题与帝国抱负粘在一起，修昔底德记叙这场希腊人的内战就与希罗多德的《原史》有相同的关切：如果希腊人要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政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柏拉图和亚

① 参见林国华，《在灵泊深处：西洋文史发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页 58—69。

②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前揭，页 12，16。在 19 世纪中期，古史学家弗里曼（E. A. Freeman）曾提出过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古希腊城邦合纵连横的“联盟”，从制度上讲相当于“邦联国家”（Federal States）。城邦“联盟”并非仅仅具有战争状态下的军事意义，实际还有政制意义。这意味着公民有双重身份：既是城邦的公民，又是“联盟”的公民。关于这种所谓“邦联国家”的性质及其起源，参见 J. A. O. Larsen, *Greek Federal States: Their Institutions and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页 xi—xxviii 及页 3—11。问题在于，古希腊城邦政制时期从未出现过长期的固定联盟，而是不断出现联盟重组。既然如此，“联盟”公民的身份就没有政制意义。沃尔班克在“Were there Greek federal states?”一文中对弗里曼观点提出异议，见 Frank W. Walbank, *Selected Papers: 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页 20—37。

③ 参见韦特格林，《论修昔底德叙述的结局》（彭磊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经典与解释”辑刊第 17 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页 117—140。

里士多德关于何谓最佳政制的不朽思考。^①

伯罗奔半岛战争之后,斯巴达并没有能够凭靠自己主导的联盟统一泛希腊。公元前386年,斯巴达与波斯帝国签订 Koine Eirene [共同和平] 条约,企图借助外部势力统一希腊。公元前382年,阿格西劳斯王以诈术进占忒拜,雅典担心斯巴达坐大,积极支持忒拜。厄帕米农达斯将军通过改革让忒拜焕发国力后,随即对斯巴达开战。在公元前371年击败斯巴达后,忒拜又试图染指东北部紧邻马其顿的色萨利(公元前369—367)。^② 忒拜崛起,雅典又深感不安,希望与忒拜和斯巴达三分天下,提议签订一个所谓旨在维护各城邦独立地位的“和约”,确认各自的附庸城邦不受侵犯。忒拜政治家拒绝签署这个“和约”,毕竟,雅典或斯巴达占政治优势时,从未考虑过各城邦的独立地位这回事。

总起来看,古典时期的古希腊史是一部充满内忧外患的战争史,我们不应该仅仅记得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半岛战争。无论希波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希腊诸城邦之间的内战以及外敌入侵引发的单个城邦的对外战争连绵不断,而且两类战争还经常交织在一起。希腊人参与波斯人的征战或内战,波斯人也参与希腊人的内战;斯巴达曾是波斯帝国在希腊的最大敌人,后来竟然成了“第一要好的朋友”,并“在波斯的支持下瓜分到了整个爱琴海希腊”。^③ 既然泛希腊诸城邦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单位,对外战争就显得十分含混,希腊人替波斯人当雇佣军打希腊人也屡见不鲜。^④ 波斯王大流士统治时期,“一些希

① 参见福特,《统治的热望:修昔底德笔下的阿尔喀比亚德和帝国政治》,未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1964。

② 阿格西劳斯王(Agesilaus, 公元前399—361)的斯巴达与厄帕米农达斯(Epameinondas, 公元前379—?)的忒拜交手,参见卡特利奇,《斯巴达人》,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页186—216。忒拜试图介入色萨利,参见John Buckler, *The Theban Hegemony, 371—362 B. 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页111—129。

③ 参见卡特利奇,《斯巴达人》,前揭,页195。

④ 参见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361—365。

希腊人甚至期待波斯的统治，因为，成为世界主义的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可以获得许多经济机会，接触非希腊的知识和文化传统”——波斯甚至成了希腊人的如今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避难所。^①

雅典、斯巴达、忒拜先后试图结束泛希腊的分离式政治状态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希腊人不喜欢“一统”政制，马其顿王国(Macedonia)的崛起就会反驳这一结论。^②反之，我们倒是有可能推想：泛希腊一直处于分离式政治状态，仅仅因为没有哪个城邦具有引领这个文明民族走向“一统”的能力。我们的古希腊文明研究如果仅仅关注其文化成就，看不到泛希腊诸城邦一直面临统一问题，难免对希腊诸城邦连绵不断的内战视而不见。比如，围绕德尔菲神庙就曾发生过四次内战，史称四次“圣战”(Sacred War)。第一次“圣战”始于希波战争之前的公元前 595 年，起因是德尔菲的港口城市基尔哈(Cirra，位于科林多海湾北部沿岸)对前来朝拜的香客收取过路费，导致邻近各城邦发动邻邦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圣战”，历时长达 10 年。马其顿统一希腊的系列战争被史家归入第三次(公元前 356—346 年)和第四次(公元前 340—338 年)“圣战”，从而，最后两次“圣战”也是希腊实现统一的内战。^③

文明民族的政治统一凭靠其中的某个政治单位

在现代欧洲人眼里，马其顿人与希腊人的种族关系即便不类似

① 参见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0，页 48—49；即便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及其城市，亚历山大从波斯人手中夺取控制权时，与其说是解放者，不如说是征服者。参见博斯沃思(A. B. Bosworth)，《亚历山大帝国》，王桂玲译，西宁：青海出版社，2006，页 237—244。

② John Buckler 的 *Aegean Greece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 (Leiden, 2003) 一书提供了一部清晰的希腊城邦谋求一统的历史：从伯罗奔半岛战争结束到马其顿王腓力二世。

③ 参见 John Buckler / Hans Beck, *Central Greece and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页 211—276; John Buckler, *Philip II and the Sacred War*, Leiden, 1989。关于马其顿的崛起，参见博斯沃思，《亚历山大帝国》，前揭，页 4—16。

于不列颠人与苏格兰人,也类似于德意志人与奥地利人。^① 这个类比会让我们想到德意志人的历史状况:自16世纪以来,英格兰、西班牙、法兰西逐渐成为拥有独立王权的民族国家,并图谋在欧洲取得政治优势,神圣罗马帝国却日益碎片化(fragmentation)。到了18世纪,受列强围困的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问题日益迫切,但要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三百多个大小王国和公国总得有某个政治单位主动担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普鲁士王国的史学家德罗伊森(Joh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让“希腊化”(Hellenismus)成了一个政治史学论题。^②

换言之,虽然有“希腊化”研究之父的美誉,在德罗伊森那里,作为史学论题的“希腊化”实际隐含着德意志的统一这个现实政治问题。莫米利亚诺注意到:德罗伊森早年完成《亚历山大大帝》(*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ßen*, 1833)和两卷本《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1836/1843)之后,“把40多年的学术活动献给了普鲁士史”,因为他“敏锐地感受到德意志面临的政治问题”。就在人们以为德罗伊森忘记了自己的“希腊化”研究之时,他又“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他出版了《希腊化史》的修订而且充分更新的版本”。^③ 在德罗伊森眼里,“马其顿是古代的普鲁士”——或许更应该说:德罗伊森希望普鲁士应该像古代的马其顿统一泛希腊那样,出面统一四分五裂的泛德意志。莫米利亚诺还敏锐地看到,德罗伊森的《希腊化史》与兰克的成名作《罗曼-日耳曼诸民

① 参见斯通曼,《亚历山大大帝》,孙慧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页4。马其顿人属于古老的希腊血统,参见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前揭,页366。认为马其顿人不是希腊人的唯一历史依据,据说是希腊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希腊人认为听不懂北部山民马其顿人说的话。参见卡特利奇,《亚历山大大帝:寻找新的历史》,曾德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页9。

② 德罗伊森之前和之后的“希腊化”概念用法,参见 R. Bichler, *Hellenismus.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eines Epochenbegriffs*, Darmstadt, 1973, 页33—139。

③ 更新的版本将《亚历山大大帝》与两卷本《希腊化史》合在一起,共分三卷:1. Theil: *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ßen*; 2. Theil: *Geschichte der Diadochen*, 3. Theil: *Geschichte der Epigonen*, Gotha, 1877—1878 / Basel, 1952—1953 / Darmstadt, 1998。

族史：1495—1514》“属于同一文明的国家间关系的史书”。^①

由此可以理解，德罗伊森的“希腊化”概念实际上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方面：政治的和文化的方面”（莫米利亚诺语）。^②“希腊化”首先指马其顿王国实现了泛希腊的“一统”，然后才指希腊文化的扩散。对于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来说，“希腊化”的政治方面更值得关注。毕竟，德罗伊森式的“希腊化”问题意识在近代欧洲并非唯一一例。沃格林在论及腓力崛起的举措时，将他比作17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③如我们所知，路易十四曾经有统一欧洲的抱负。就此而言，“希腊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不仅涉及泛德意志的统一，还涉及到查理帝国意义上的欧洲“一统”。^④

如果马其顿人不属于希腊民族，“希腊化”就是一个莫须有的史学论题，人们应该谈论的是“马其顿化”；腓力举兵南下，对希腊人来说就应该算是异族入侵。其实，无论就语言、宗教信仰还是习俗而言，发源于伯罗奔半岛名城阿哥斯的马其顿人都属于泛希腊共同体。马其顿语不过是希腊语的西北部方言，马其顿人崇拜宙斯和阿尔忒米斯（Artemis）神，而且很早就参加被视为泛希腊共同体标志的赛会，王室甚至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赫拉克勒斯。希波战争初期，马其顿即便迫于压力顺从波斯人，背地里仍给自己的希腊同胞暗送情报。^⑤

① 参见莫米利亚诺，《德罗伊森：在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见氏著，《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晏绍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页318—320。德罗伊森的学术生平与德意志形成民族国家的关系，参见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吕森、胡倡智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编者“引论”，页7—10；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014，页254—263。19世纪上半叶，史学在普鲁士王国学界突然兴盛与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诉求的关系，参见基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黄艳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 关于“希腊化”的“文化”方面，参见陈恒，《希腊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③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前揭，页111。

④ 亚历山大形象在中古时代的流传概况，参见 Michael Pfrommer, *Alexander der Große. Auf den Spuren eines Mythos*, Mainz, 2001, 页16—22。

⑤ 参见 M. B. Hatzopoulos 的“Macedonia and Macedonians”和“Macedonians and Other Greeks”两文，见 R. Lane Fox 编，*Brill's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 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Macedon, 650 BC-300 AD*, Leiden, 2011, 页43—50, 51—78。

马其顿位于伯罗奔半岛东北部,其地缘位置对希腊人来说非常重要:西北面有非希腊血统的伊利里亚人(Illyrians)部族,北面有佩奥尼亚人(Paeonians)部族,东面则是被波斯帝国纳入属地范围的色萨利人(Thracians,旧译“色雷斯”)部族。由于与西北面的伊利里亚和南面的希腊各城邦地区都有高山阻隔,“马其顿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希腊人抵抗真正的异族——即伊利里亚人,毫无疑问,在那时甚至还有凯尔特人——的北方屏障”,替泛希腊诸城邦阻隔着来自北面大陆纵深的异族威胁。^①

马其顿起初是个地理名称,而非政治共同体的名称,换言之,马其顿形成王国的历史其实相当短。^② 这里没有出过大诗人或大哲人,但不能因此把它视为泛希腊共同体中的“异类”,否则,这样的“异类”在泛希腊实在太多。何况,这个“原始的君主制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希腊社会”,以至于可以说,尽管马其顿不是城邦政制,如果其王者模仿荷马笔下的英雄,这种“英雄君主制”反倒“很容易被认为是希腊历史的延续”。^③

由于内部豪强贵族势力的制约,马其顿王国的王权一向疲弱,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国王阿尔克劳斯(Archelaus,公元前413—前399年)才建立起第一支像样的王国军队。有了英明能干的国王,弱国可以变成强国,王者无能,强国也会变成弱国甚至走向亡国。^④ 公

① 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前揭,页366;亦参 William S. Greenwalt, “Macedonia, Illyria and Epirus”, 以及 Denver Graninger, “Macedonia and Thessaly”, 见 J. Roisman / I. Worthington 编, *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Chichester, 2010, 页279—305; 306—325。

② 参见 Carol G. Thomas, “The Physical Kingdom”, 见 J. Roisman / I. Worthington 编, *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前揭, 页65—80。

③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前揭,页109;关于古希腊早期的“王政”及其向城邦政制转变时期的思想史描述,参见 Francis Dvornic, *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Political Philosophy: Origins and Background*, Vol. I, Washington, D. C., 1966, 页132—154。

④ 参见 Sławomir Sprawski, “The Early Temenid Kings to Alexander I”, 以及 Joseph Roisman, “Classical Macedonia to Perdiccas III”, 见 J. Roisman / I. Worthington 编, *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前揭, 页127—144, 145—165。

公元前 359 年，国王佩尔迪克卡斯（Perdiccas）在领军与伊利里亚人的交战中阵亡，在忒拜当人质的腓力二世（Philip，公元前 382—336 年）回国摄政，时年 23 岁。腓力的父亲阿敏塔斯三世（Amyntas III，公元前 393—369）是先王，在位 20 多年，治国有方。腓力颇有抱负，他当仁不让，不到一年就废黜年幼的侄子自立为王，随即强化王权，削弱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权力，推行币制改革和军事改革，以至看起来是个地道的僭主。腓力创建起一支新式常备军，按协同作战方式将骑兵、步兵组织成整体，配以轻型后勤部队。腓力首先北进打击伊利里亚人和佩奥尼亚人，使其不敢再犯马其顿，随后东进蚕食忒腊克的属地和金矿。清除外部威胁之后，腓力随即南下发起统一泛希腊城邦的战争。公元前 338 年，腓力在希腊半岛中部的凯隆尼亚（Chæronea，普鲁塔克的故乡）与雅典和忒拜组织的反马其顿盟军决战（斯巴达已经无力参与盟军）。击溃盟军之后的次年，腓力以希腊人的传统方式统一希腊：在科林多召集泛希腊城邦会议，宣布建立以马其顿为首的城邦联盟，实现希腊城邦之间的“永久和平”。这次城邦会议还做出一致对外的政治决断：进击波斯帝国。对于希腊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决断。毕竟，两百年来，波斯帝国虽然一直未能吞并希腊，至少是希腊长期“四分五裂”的重要外在因素。

不过，腓力建立的马其顿联盟仅仅表面上实现了希腊的统一。虽然大多数希腊城邦加入了马其顿主导的联盟——斯巴达被“故意排除在外”，以确保原属于伯罗奔半岛同盟的诸邦国效忠马其顿，^①腓力仍然同意各城邦保留自治权，并没有随即着手建立中央集权式的大希腊国王权，而是力图先解决长期觊觎希腊的宿敌波斯帝国。^②换言之，尽管凭靠君主式的王权结束了希腊城邦之间的内战，甚至确认了国家的敌人，腓力王实际上并未结束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敌我

① 参见卡特利奇，《斯巴达人》，前揭，页 210。

② 参见 R. Lane Fox，“Philip of Macedon: Accession, Ambitions, and Self—Presentation”，见 R. Lane Fox 编，《Brill's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前揭，页 335—366。

不分的现实状况——甚至亚历山大后来进兵至波斯本土之时，仍然有大量希腊雇佣军在波斯军队中与自己的希腊同胞作战。

准备收复波斯帝国侵占的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前夕，腓力突然遇刺身亡(公元前 336 年)，年仅 46 岁。腓力猝死，马其顿旋即出现宫廷危机，北方异族也趁机企图收复失地。更要命的是，希腊各邦跟着出现如今所谓分离主义动乱。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the Great, 前 356—323)继位时年仅 20 岁，他首先清除宫廷内部的篡权威胁，随即对外发动多瑙河战役和巴尔干战役(公元前 335 年)，制服北方异族，然后南下铁腕平定希腊城邦的分离主义动乱——忒拜城试图抵抗，被亚历山大夷为平地。^①

亚历山大的一统帝国

亚历山大迅速恢复已经遭到背弃的科林多联盟，但取消了盟约原本赋予各城邦的自治权。尽管如此，亚历山大与父亲一样，并未着手从制度上统一泛希腊城邦。继位仅仅两年(公元前 334 年春)，亚历山大继承父亲的未竟之业，率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击波斯帝国属地。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他十分清楚，没有控制爱琴海东岸的陆地纵深，希腊人不仅不可能控制爱琴海，还会承受来自东岸陆地异族没完没了的威胁。^② 因此，为了建立稳定的大希腊国，必须首先向东扩张。

亚历山大很快就在小亚细亚的格拉尼库斯河(Granicus)首次大破波斯军队，解放了爱奥尼亚的希腊人；次年又在伊苏斯平原(Is-sus, 今叙利亚境内)击溃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亲自率领的 10 万大军，生俘大流士家人，打开了进兵东地中海港口和埃及的战略通道。随后，亚历山大挥军横扫东地中海四周陆地，夺取波斯帝国控制的叙利

① 参见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陆亚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 6—7。

② 参见斯通曼，《亚历山大大帝》，前揭，页 21。

亚、腓尼基、埃及，巩固了东征波斯本土（今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省）需要凭靠的前进基地。公元前 331 年春，亚历山大从埃及出发继续东征，渡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高伽米拉（Gaugamela，今伊拉克境内）再次重创波斯军主力，随后取巴比伦城，进占美索不达米亚，攻入波斯本土。亚历山大领军夺取波斯国库所在地苏萨城（Susa），焚毁帝国宫廷所在之地波斯城（Persepolis），为公元前 480 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焚毁雅典城报仇雪耻。此举不仅为长达两百年的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冲突划上句号，而且表明亚历山大对于自己作为希腊文明民族的政治代表有明确的自我意识。

灭掉波斯帝国之后，亚历山大仍然没有着手大希腊国的中央集权式建设，而是从里海南岸继续东进，经帕提亚夺取巴克特里亚（Bactria），然后于公元前 327 年夏天兵分两路进军印度。^① 后来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百思不得其解：亚历山大为什么只一心占取地盘，不注重帝国自身的建设？事实上，亚历山大进击波斯时，希腊内部政局仍不稳定，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三世（Agis III，公元前 338—331 年在位）多次叛乱，亚历山大不得不派部将安提帕特（Antipater）前往平定。今人沃格林也说：如果从巩固大希腊国的角度考虑，亚历山大不应该继续向东远征印度，反倒应该转身向西剪灭正在崛起的迦太基和罗马，战争的胜利却让亚历山大漫无目的似地东进印度。其实，古罗马史家李维已经感叹过：如果亚历山大转身西进而非东进，他所取得的成就简直难以想象。^② 沃格林甚至将亚历山大远征印度

① 亚历山大征战历程的简厄描述，参见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1978），陈恒、茹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页 18—24；详参博斯沃思，《亚历山大大帝国》，前揭，页 33—146。

② 亚历山大是否没有进兵西部地中海周边陆地的计划，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稍晚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纪事家蒂迈欧（Timaeus of Tauromenium）的《史记》来看，当时的希腊知识人对地中海西部、尤其迦太基和罗马崛起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参见莫米利阿诺，《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前揭，页 50—62。希腊化晚期的狄俄多儒斯在其《史籍》中记载的亚历山大的进一步征服计划包括迦太基、意大利和西西里，但“有多大大可信度也很难说”。参见库济辛主编，《古希腊史》，甄修钰、张克勤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页 311。

视为他缺乏政制观念的表现,并与中古后期的蒙古人远征欧洲相提并论:两者都是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制观念,就不可能把文明形态大相径庭的被征服民族“捏合成一个新政治单位”,征服的地区再大再多,又有何意义呢。^①

就亚历山大的个人抱负和帝国意识而言,沃格林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大其词。远征印度既是亚历山大为了实现自己走到大陆极限的人生理想,也是为了彻底消除希腊人一直面临的来自东方的威胁。按照当时的地理知识,印度是大地的东方尽头,濒临东海:“亚里士多德认为,站在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译按]今喀什米尔与阿富汗交界处)的顶端就可以看到大海。人们并不知道印度的大小,也不知道中国的存在。”^②既然要彻底消除爱琴海东岸陆地民族的威胁,亚历山大必须进兵到东方陆地的尽头。何况,当年波斯帝王大流士统治的疆域已经从利比亚延伸到克里米亚,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从爱琴海延伸到印度河平原——亚历山大必须进兵到印度河谷,才算彻底灭掉波斯帝国。^③

再说,亚历山大的征服行动所覆盖的地域尽管相当广阔,所花费的时间才短短十年。公元前324年初,亚历山大从印度河三角洲回师,即选定巴比伦城为帝国国都,并把波斯划分为六个行政区,安排波斯贵族出任地方长官,还组织马其顿军人与波斯女人通婚,显然意在把希腊人和波斯人打造成统一的文明政治单位。^④ 既然亚历山大

①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前揭,页113—114。

② 斯通曼,《亚历山大大帝》,前揭,页53。

③ 布罗代尔的妙笔提供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解释:他一方面说,“亚历山大大帝的过失在于过低估计了西方的能量,只顾一股脑儿地奔向那垂涎已久的辉煌”,另一方面又说,当时的希腊人面临向东或向西扩张两种选择,但向东“更具有诱惑力”,毕竟,地中海西部尚未让希腊人看到“文明”的分量。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吕华等译,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页216—217。

④ 参见博斯沃思,《亚历山大帝国》,前揭,页219—237。19世纪上半叶的一位匿名作者在其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Oxford, 1841) 一书中总结过:为了融合希腊人与波斯人,亚历山大采用了七大政策。参见 H. M. de Mauriac,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Politics of ‘Homonoia’”, 刊于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0(1949), 页109—110。